

書 評

范 宜 如*

胡曉真

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

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7年，408頁，ISBN 9789863502128

胡曉真的學術路徑是一種折照的鏡像，從才女傳統之轉化（《才女徹夜未眠——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》），到晚清城市文化與社會議題（《新理想、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——清末民初上海「傳統派」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》），開啓女性敘事文學與近現代研究的新境，在在可見文本詮釋的洞見與易代轉折的文化視野。本書則另開局面，走進古典文學研究中長期被忽略的「西南」，一個「地理、政治、文化、象徵上的邊徼空間」。

從《史記》〈西南夷列傳〉以「西南」與「夷」合稱，邊徼之地結合奇景、異俗，形成一個想像的地理。無論就地理的或歷史文獻上的「西南」，大多爲人類學、史學界著力研究之處。而論及西南的文學研究，或爲少數民族文學史（如彝族文學史），或以地域爲範圍（如雲南文學史）¹；而忽略了西南地域所可能涵攝的文本視野。胡曉真則迂迴其間，對應到

2017年11月20日收稿，2018年1月30日修訂完成，2018年2月1日通過刊登。

*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。

Fan Yi-ju is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

1 胡曉真，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7），頁2。

文人的心靈世界、宦邊官員的西南經驗，甚至是內部族群的音聲話語，展現其知識內涵與人文思考。

本書涵蓋的議題由西南地域自身的複雜性所涉及的戰爭書寫，乃至於中央與地方的頡頏、官員的觀覽與治理、女土司與帝國皇權之間的對話及其衍生的文化現象。如胡曉真所述，「西南在明清文學中特別重要的主題為文化、政治、戰爭、美學、地理、民族、性別諸多問題的輻輳交點。」² 在文學研究視野下的西南敘事，一方面再現（廣義的）文人將「西南」文本化的歷程，另一方面透過歷史考證、田野深描、理論建構以及文學的視角，考察西南的自然與文化對文人心靈的影響。

本書分三大部分，茲分述如下。

第一編〈情感與世界：西南敘事的內向與外向敘事〉分別以陸次雲及陳鼎為個案，透過「跳月」的細節敘述與婚俗的探討，看見文人面對「西南」文化表徵的情感詮釋。

〈從峒中跳月到天下輿圖〉一文除了觀照陸次雲西南遊記的「知識與趣味」，也演繹其行旅與書寫之版圖。胡曉真指出，文人的「好奇」，「不應視為出於文化偏見的獵奇，而應思考這是一種驅動文人開放自我並試圖理解異質與他者的力量」³ 同時也是對外界探索的可能，藉此探勘西南邊域所連結的新世界觀。

陳鼎《滇黔土司婚禮記》中的跨族群婚姻，創造了「真實與虛構交織的寓言世界」，所述的「室老制」，以老年寡居之婦控制婦女的婚姻生活，其實也是另一種窺視，隱藏了規訓與權力的深層意涵。胡曉真將此書比擬為「書寫自我的民族志」，⁴ 意在突顯這本書結合個人的生命經歷與社會形構的書寫歷程；透過書寫滇黔婚禮的形式與意涵，審視自身的文化根源，構築理想中的「禮治世界」。

對讀兩章的內容，值得思索的是，陸次雲的「跳月」記述，並非來自現場觀察；而陳鼎書寫與當地「龍土司」女兒聯姻的個人經驗與私密生活，其實也未必全是親身經歷。陸次雲如何透過虛構創造真實的樣態，

2 同上註，頁4。

3 同上註，頁190。

4 同上註，頁129。

而成爲文人（如王士禛）轉引的內容？而陳鼎以「內部的觀察者兼參與者」的敘事姿態，西南禮俗又如何滲入漢族的禮教思維，反轉了華夷之間的主從關係？值得注意的是，書中一再指出，透過「我輩」的聯結，以及不同文類的對話，隱然創造了一個「西南經驗」的系譜。譬如湯西崖在旅次中見前輩田雯的題壁詩有感，陳鼎在《滇遊記》書寫對於楊慎的認同，陸次雲對於田汝成的追慕與承繼等等。這也是胡曉真在推演資料、耙梳文獻，解讀作者意向，透視「好奇領異」的心理層面的精彩論述。

由於西南地域的特殊性，與戰爭、邊界、動亂等自有關聯。第二編爲〈戰爭與統治：官員視野的政治暴力與個人美感〉，即聚焦於書寫者的身分及其地域認同。

方志、筆記的撰寫原本有其格式，但文人總會瓦解既有的範式，展現個人的審美趨向及思索。無論是田汝成的《炎徼紀聞》或是田雯的《黔書》，宦邊經驗成爲自我形塑過程的敘寫。《炎徼紀聞》做爲「戰爭記事文學」的代表，從敘述戰役細節、議論征討策略；以身體爲喻論及政治之療救，無不隱含田汝成的敘事聲音，更成爲通俗敘事的資源。而藉由《炎徼紀聞》與《西湖遊覽志》的對照，在異地與家鄉的兩端，以「故實」的考論，成就了「故事」的講述，更顯示了田汝成的自我意識與西南視野、江南情懷的位置。

作爲志書的《黔書》，有其文類的複雜性與書寫位置的範限。田雯結合「方志體」的事實陳述與人文精神，體現治術與文采之間的知識與美感。胡曉真分析《黔書》「纂組成文」的手法及器物書寫，並對照《黔書》與《古歡堂集》的寫作風格，以論證黔地山水成了田雯的「詩情實驗場」。⁵ 西南經驗的重述是個人自我認同的歷程，但〈黔陋說〉「豈不陋哉」之語，卻又消解了黔地治理經驗的理性呈現。可以看見治邊官員既要站在帝國的位置發言，又必須抵抗自己來到邊徼之地的自棄心態。有趣的是，論辯的兩方並非黔地與中原的居民，而是治黔與游滇者，由是可見「西南」地域並非單一的樣態，有其複雜的形貌。

對於一個宦邊的官員而言，如何劃分內部與外部？從歷史的脈絡來

5 同上註，頁200。

看，是「內部的他者」？抑或是永遠的「異己」？這些內部與外部的劃分，是既有的固化思維？還是透過帝國權力與疆界劃分、人種區隔、語言隔閡的範限？田汝成的鄉邦敘述兼具傳奇與崇實的態度，田雯則在治書框架與文學興味兩端展演。透過胡曉真多元視角的解讀，志書與筆記不單只是官員的紀錄，而有情感與知識的向度。

一如胡曉真自言，西南敘事往往是「複寫」(duplicate)與「覆寫」(overwrite)，在想像與紀實，真實與虛構之間競寫。⁶ 第三編〈性別、歷史與文化多音——明清與當代的交錯視域〉觸及邊政與性別、貞節與忠義、觀看與慾望以及西南邊域與帝國的權力交鋒。不僅從歷時性的角度再現女英雄的形象，同時推演到現代中國對於女英雄的形象認知與歷史轉折。

〈前有奢香後良玉〉論及女性、異族與中央政權的協商、抗拒及和解的關係，具有戲劇性「裸撻」奢香的事件，透過文人的記載與流傳，輾轉成爲各種版本，甚至形成了「接受史」。⁷ 奢香形象受到不同時期的歷史觀點與國族立場的影響，而有不同的定位。文本軌跡中多可見奢香與秦良玉並稱的現象，藉由女性的位置，突顯了西南地理的「異」識。以戲曲《芝龕記》爲例，胡曉真就「性別」與「身體」的角度，論述秦良玉以女身建立陽性事業，其間陰陽消長與歷史演進，轉化成「女英雄」，隱涵著時代集體心理的投射。西南邊域的女土司及女英雄讓歷史與傳奇有了互證的可能。當女性形象因應歷史的解釋而有了挪移與定位，其中的敘事聲音與心態則顯示了文人的心理疆界。

〈華夏忠臣遭遇邊域倮蟲〉以夏敬渠的《野叟曝言》和屠紳的《蟬史》爲探討對象。《野叟曝言》小說的現實背景與廣西苗峒經歷，突顯了華夏文化的優越心理。透過小說人物文白在苗疆體驗的男女關係，以及當地苗人對於漢人習俗的反應，翻轉文明與野蠻的對比。小說的多音混雜展現了文化接觸的意涵，而漢文化與苗文化的矛盾與融合，既可對應小說

6 見「邊緣知識的建構與傳播：文學、史學與人類學觀照下中國西南專題座談會紀要」(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)，<http://mingching.sinica.edu.tw/Academic-Detail/576> (2017.11.4 上網檢索)。

7 胡曉真，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，頁 223。

的現實背景，又可見禮儀與習俗之間的妥協與調整。毒蟒的交合敘述所顯示的奇詭的暴力，以及苗族圖騰神話的隱喻，更隱藏著漢人與苗族接觸時隱身的恐懼。

《蟬史》以情慾之喻比擬君臣忠義，觸及漢族忠臣故事的敘事模式則透過其他非漢民族而實踐。這些情節的設計，導向價值系統的衝撞以及物種界線的流動，是值得深思的課題。胡曉真認為「《野叟曝言》的毒蟒故事與《蟬史》的五蟲寓言，分別代表『用夏變夷』與『夷夏同化』兩種不同的文化認同態度。」⁸ 王德威在序言則提出潛「夷」默「華」的思索。百蟲與蟒分別歸之於苗族神話，更可以看出清代才學之士的西南經驗如何在考辨、象喻之間迴旋往復。以「蟲」喻示、反思人的處境，《蟬史》的五蟲之說質疑了族群的界線，更顯現異質性的多元世界觀。

作為代結論的〈征、流、寓〉一章，所論《大理古佚書鈔》的傳衍，論述精彩且寓意深刻。既為文本的散「佚」，也是當地「逸」失的白族故事；指涉了西南歷史的失「憶」，也充滿記憶的技「藝」。相對而言，這個歷史的存留以及文本的生成歷程，就超越了文獻真偽之辨，反而直指文學與歷史之所以存在的深刻意涵。

胡曉真採用「互證與競逐」⁹、「參照與攻錯」的研究方法，透過文本、理論與敘事的交鋒，性別、族群敘事與帝國歷史的相互交涉，將多樣的文本及複雜的史事，理出文脈，還原脈絡，賦予意義。透過古今交錯的「互觀」，全面追索所選個案，以互文性的探討，結合地域特徵，對應時代局勢與歷史事件。以一個彈性的不斷變換的視角進行觀察，理解作者的時代限制，也能回到作者的自身處境，看見作者如何在文本中迂迴前進，或是不自覺呈現的文化思索與隱藏的焦慮。全書充滿著交織的思考，譬如討論陸次雲《峒谿織志》則與其他明清文人的書寫相對照；分析《蟬史》則呼應第一章「世界觀」的提問。藉由多元視角、互為主體的角

8 同上註，頁292。

9 胡曉真指出：「與西南地區有關的文本，不論其文類歸屬為史、為志、為記，或小說，都展現一個共同的特色，亦即歷史、傳說、見聞與想像虛構在同一話語體系中互參互證，又彼此競逐，形成一個『西南知識系統』。」見是書第四章〈治理之書與審美經驗〉，頁179。（粗體為筆者所強調）

度詮釋文本，深切反思敘述者的位置以及文類特質，剖析書寫者自身的位置、立場與限制；進一步反省敘述的聲音及其囿限，證成「需要文學的感知才能探觸西南敘事的核心」。¹⁰

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一書像摺疊收合的百寶箱，涵括的研究課題包含華夏中心與邊緣、國族與民族、女性與倫理、忠節與自我、戰爭與移民等等。本書除了開啓古典文學研究的新面向，對於文學學門自身，也有新的啓示。首先，本書所討論的範圍涵括各種類型的文本，除了詩文集以及戲曲、小說之外，包含官修方志、私人方志、圖版、筆記等等，擴展傳統對於「文學」的界義。再者，將輯錄彙編之作品也放進作者創作視野的考量，也將「翻譯」納入文學的面向，諸如陸次雲《纖志志餘》書中「漢文」與「苗書」的對照，吳淇《粵風續九》中謠歌的翻譯，狼歌的意譯，《黔書》所記載的方言等等。從語彙反思地方特色，關注異域與異族的音聲與情感，也顯示了西南文學研究與古典文學的差異與類同。

本書試圖指出，文學研究的確需要借鑑其他人文學科的資源，與當代的史學、人類學對話；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文學詮釋也可以提供其他學門的思考面向。以「奢香」事件為例，歷史學界已然提供研究的定論，但吾人並非否定其說；正因為已有定見，那麼，更需要深入思索這些增補、刪修、挪動的文字背後所隱藏的意涵，讓「文獻」呈現「文本」的張力。¹¹ 透過「文學人」的敏銳，細讀文本之中更細緻，或說更隱晦的多重意義及細節。再者，文學研究除了闡釋遊邊人士、宦邊官員的情感與心境，文學文本更試圖進入異域的群體，嘗試理解「無史」的地方感受。此外，透過不同文類的梳理，其實也碰觸到「歷史分期」的限制。對於邊疆地區而言，與其以政權的消長作為帝國的分野，不若從治理的角度及文學的表述重新省察「實際上不斷變換的歷史景象」，戲曲中秦良玉的形象與明清鼎革的情感認同相關即為一例。此外，從文學的角度可以重新思索方志的意義與其他文類的義涵。譬如陳鼎《滇黔土司婚禮記》，可否為古典的民族誌？再者，陳鼎的書寫甚至涉及了明末亡國意識與西南地方

10 胡曉真，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，頁31。

11 王明珂，《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：文本與表徵分析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公司，2015），頁170-171。

特質的對應。從各篇文章交叉的脈絡顯示，西南既是一個穩定的詞彙，也是一個亟待開發詮釋的場域。這些都是可以與其他學門對話的課題。

本書封面選用黃向堅的《萬里尋親圖》，本身就是一則西南的故事，這裡面有倫理秩序、行旅敘事，更是亂世、歷險的傳奇記憶。¹² 透過圖像，引向西南研究的新的可能，恰與本書英文書名 *The Southwest in Ming-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* 形成互文關係。¹³

胡曉真在《新理想、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》序文中提及：「這是近現代文學的研究，但是處處點染著我對明清古典文學之探索的印記。」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本書雖是明清文學的研究，其實也領向近現代文學的探索。彼此交織，互為參照；取徑文學，鏡像西南，迴盪出壯闊的學術波瀾。

12 黃向堅，《黃孝子紀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）。此書收有黃向堅〈尋親紀程〉及〈滇還日記〉各一卷，附〈黃孝子滇南尋親圖冊〉題跋及歸莊〈黃孝子傳〉。關於黃向堅萬里尋親的論述，可參考呂妙芬，《成聖與家庭人倫：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7），頁165-182。毛文芳，〈黃向堅「萬里尋親」紀程與圖繪之探析〉，載於馮天瑜主編，《人文論叢（2009年卷）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369-388。

13 本書的中文書名與英文書名各有其意涵。胡曉真指出：「使用『敘事』而不使用『書寫』，意在突顯不同類型的文本在表現西南時蘊涵高度敘事性，意即觀點、記憶與構造。」（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，頁3）若能從古典文論的視野梳理「敘事」一詞的脈絡，當更完善。

